

吴中杰评点

吴中杰  
编著

鲁迅小说



复旦大学出版社

吴中杰评点

吴中杰  
编著

鲁迅小说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吴中杰编著. —2 版.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309-03660-3

I. 吴… II. 吴… III. 鲁迅小说-文学评论  
IV.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3612 号

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第二版)

吴中杰 编著 插图作者 赵延年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邵 丹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425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印 数 6 001—11 100

---

书 号 ISBN 7-309-03660-3/1·238  
定 价 3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在鲁迅著作中，人们研究得最多的是小说。有单篇评论，有综合分析，有通俗讲话，有专题探讨，论著之多，难以计数。然而，独有评点之作，则未之见也。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法，多用于小说和戏剧研究。卓然成家者，有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辈，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评点派，他们对于《水浒传》、《西厢记》、《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的评点，至今仍有存在的价值。但自从西洋批评方法传入中国之后，评点之法也就衰落了。

其实，评点法有一般的评论文章所无法替代的长处。评论文章大抵只能论述作品的主旨大要，却无法顾及它的细微之处，而作者的情思，则往往体现在抒写的笔墨中，伸展到作品的各个角落，不将此中意蕴点出，就无法全面阐发作品的内涵。特别是鲁迅的小说，笔墨寓意深刻，时时触及现实，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容，不是主题论述所能概括得了的，采用评点法，或可弥补评论文章的不足。

评点派要求对作品进行细读，与英美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新批评派强调文学的内部规律，偏重于艺术形式方面的研究，而评点派则对内容和形式都很注意，从作品思想、人物性格，到谋篇布局、笔墨技巧等等，无所不评，无所不点，似更全面。在过去的评点中，也有些评点者将写作技巧归纳成几条框框，弄成死板的形式，到处乱套，这只是评点派的末流，并非评点方法本身之错。而且，评点笔墨往往也较评论笔墨更有情趣，点到即止，要言不烦，发人深思，此类批评方法，宜乎进一步发展也。当然，被评点的作品也要内涵丰富，才能经得起评点，若面对单薄的作品，则评点者大概也就无话可说了。

古代小说的评点，方式很多：有眉批，有夹批，有回前总评，有回末总评，还有双行夹批之类，一书之中，综合使用。但夹批夹在正文中间，时时割断正文，

双行夹批则夹在两行之间，排印不便，我都舍弃不用，回前总评和回末总评都是全篇综合评点，可以归并于一，所以我只用眉批与回末总评两种。但眉批是直排本的说法，现在的横排本，当然是改为边批了，鲁迅写的是短篇小说而非章回小说，故回末总评也就成为篇末总评。但比起我所评点的鲁迅杂文和鲁迅书信来，则多了许多边批，格式已是两样了。盖因小说的形象化程度高，寓意丰富，单是篇末总评，难以尽其意也。

鲁迅的小说创作，自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但其起始，却要早得多，可以上溯到1903年所写的《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取材于古代希腊的历史故事，以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来激励国人，写得很是激昂慷慨。但是编译的成分较多，还不能称之为创作。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说：“例如最先的两篇，就是我故意删掉的。一篇是‘雷锭’的最初的介绍，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可见这篇小说虽非原创，但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尚和鲁迅早年的浪漫情怀，还是值得注意的。但我们仍尊重鲁迅自己的意见，不将此篇收入他的小说集内，而只是收进了他自称“最初排了活字”的“文言的短篇小说”《怀旧》，作为《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个短篇集之外的附录。而且，《怀旧》在鲁迅的创作历程中也显得更为重要，从这篇作品开始，他转向了现实主义方法，重于对社会进行冷静、深入的解剖。鲁迅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在这篇作品中都已初露端倪。

鲁迅只有三个短篇小说集，数量不多，而且没有长篇。这一点，常为某些论者所垢病，无论在他生前或者死后。但这垢病，却正反映出垢病者本身的毛病来：只讲数量，追求虚夸的成绩，而不知艺术贵在独创，以质取胜；而且囿于流行观念，以为只有写长篇小说才能成为大作家，而不知其他艺术形式的价值。当这种浅薄观念与浮夸风相遇时，文坛上就出现了许多无人阅读的长篇小说。这实在是一种浪费。除了浪费时间，浪费纸张以外，还有什么积极意义

呢？受此“丰收”之灾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认真读一读为数不多、篇幅不长的鲁迅短篇小说，就会觉得它是多么丰厚的了。

我希望评点本《鲁迅小说》的出版，不但能够对学生们的阅读提供一种帮助，而且也能对艺术创作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2003年1月21日 于沪上木石斋

## 序论：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

在计划经济时期，作家的地位是由长官意志划定的；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作家的影响力往往借助于商业炒作；而在两种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作家们则既要靠拢庙堂，又要深入市场，诗外的功夫做得分外吃力。

但是，文学自有它的发展规律。作家的社会价值和文学地位，既不取决于长官意志，也不能依靠市场炒作，而是由作家自身的思想趋向和作品的艺术成就来决定的。于是，时间老人就成为最权威的鉴定者，作家的价值，只有经过历史的检验，才能最后确定下来。在文学史上，有多少走红作家、有多少文坛领袖，都经不住历史长河的洗濯，褪去了鲜艳的颜色，或者被冲刷得不知去向。只有自身坚硬者，才能屹立中流，千古长存。

鲁迅，曾受到过政治的追捧，但捧的未必是他的真价值，有时，为了某种需要，还会将原意进行歪曲；他也不断受到攻击，无论是生前或死后，但攻击的也未必是他的实在缺点，因而，他始终打而不倒。鲁迅并不认为自己是完人，更不把自己当作圣人，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sup>①</sup>，又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sup>②</sup>，这就表示他要不断克服缺点取得前进的意思，他也欢迎别人的批评。但是，他始终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狙击手，这很使他失望。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有人认为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到得90年代，又有人把他当作一块“老石头”，想要踢开。但是，鲁迅还是屹立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排头，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文学和文化。这就是说，鲁迅至今没有过时，他还有着当代意义。

一个作家能够在文学史上站得住，就很不容易，还要对当前文化思想产生作用，那就更难了。但这也未必是好事。鲁迅曾经说过：“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

① 《坟·写在(坟)后面》。

②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sup>①</sup>鲁迅不是一个希图不朽的人,他曾为他攻击时弊的杂文还能结集出版而感到悲哀。但事实是,直到现在,鲁迅的作品还没有过时,这一方面是由于鲁迅思想的前卫性和深刻性,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深层文化思想变动太慢的缘故。

鲁迅作品涉及面广,它是多方位的。我们这里只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它的当代意义。

### 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这里,首先要厘清的问题是:什么是知识分子?我们常常有一种误解,以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就算是知识分子。其实不然。知识分子当然要有知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有知识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精神,这样他们才能成为一个积极的社会群体。

我国古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感,一向是很强的。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无不表现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但是,要说到独立精神,那就比较差了。他们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依附思想。大多数文人依附于庙堂,后来也有一些人依附于商家。这种依附性,也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因为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学成文武艺,只能货与帝王家。那时的文化人,叫做士。古代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缺乏后者的独立性,而被人所养。一提到士之被养,我们会想到战国时期孟尝君、信陵君等豪门的“养士”之风——他们养了许多文士和武士,为己所用。但我们这里所说,涵义要广泛得多。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所有的士,其实都是被庙堂所养,包括孟尝君、信陵君们自己,一到不被君主信任时,就只有被杀或逃亡,命运也就很惨了。既然士为庙堂所养,自然也要为庙堂服务,他们的整个思想都是围绕着庙堂的利益旋

---

<sup>①</sup> 《热风·题记》。

转的。这就叫做存在决定意识。其中志向大，自视高的，每每想做王者之师，一般的也总想弄个大官小官当当。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为中下层文士和武士走向庙堂提供了攀升之路。虽然能爬上去的人并不很多，但正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这样一来，这些“士”们，也就不去想那些于庙堂不利之事了。

但是到得五四时期，情况就有了变化。科举已经停考，士人不能再通过这条路径攀向庙堂，而大学的相对独立和文化市场的发育，又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于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催化下，就产生了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一种时代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不但体现在新文化战士身上，而且也体现在同时代其他正直的学者身上。自称“思想囿于威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的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铭中就特别强调：“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最充分地体现这种时代文化精神的是鲁迅。他不但在五四时期反对传统思想时，表现出这种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而且在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许多新文化人士与权力者妥协，甚至支持权力者的时候，他仍旧坚决维护自由思想的原则与旧势力进行搏斗。最突出的表现在1925年女师大事件中对于被压迫学生的支持，和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对于枪杀学生的暴虐者的抗争，最后他自己也被迫走出北京。

有人认为，鲁迅长期在教育部当官，却又要反对这个政府机构行政长官的政令，这是非常矛盾的，于是加以讽刺道：“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鲁迅在民国元年进入教育部是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协助他实行新的教育主张，后来政府变动而他却一直留任，那是为了饭碗问题——但在张勋复辟时期他曾辞职以示抗议；而作为一个教育部的官员，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敢于揭露教育当局以至政府执政者的反动嘴脸，坚决与之斗争，那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因为作为官员，本是受着上级政令约束的，若表现出自己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就要冒很大的风险。1925年女师大学潮中，教育总长章

士钊在“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的呈文上，提出的理由就说是“又该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拒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所以执政府马上照准。而鲁迅的答辩书中，也没有说他作为部员，在法律上是可以抗拒本部行政的。他之所以能够打赢官司，只是由于章士钊这位政法专家兼逻辑学家，竟疏忽了一项逻辑要素，在呈文中倒填了日子，所以为鲁迅所驳倒：“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当然，这与当时的司法还有相对独立性，平政院还能够据理判案有关，否则，下级是很难告赢上级的。但鲁迅作为一名教育部官员，敢于抗拒本部行政，支持被压迫的学生，后来又公开直斥政府执政者的暴虐行为，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而那些比较自由的大学教授们，却还在帮权力者说话，两者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鲁迅能持此独立精神，与他早期所接受之个性主义思想有关。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就介绍过西方思想家崇尚个性的主张和摩罗诗人争天拒俗的作品，并且提出救国之道：“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sup>①</sup>他的抗暴行动，就是这种个性主义的表现。现在，有人在考证1926年3月18日群众游行的政治背景，似乎那些学生是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的。当然，能够确切厘清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历史研究是有好处的。但不管当时的群众游行有无政治背景，执政者开枪打死游行群众的行为，总是不可饶恕的。对于此种暴行，难道不该谴责吗？

在上述斗争实践的基础上，鲁迅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提出了深一层的看法。1927年10月25日，他曾上海劳动大学做过一个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其中就说到知识分子与权力者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他说：“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

<sup>①</sup> 《坟·文化偏至论》。

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

鲁迅后期的同情和支持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前期抗暴思想的延续。在广州，他目睹了国民党新军阀对于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的疯狂屠杀；到上海后，又亲身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和通缉。这不能不引起他的反抗。对当时共产党的某些举措，其实他并不很赞成，但是，为了支持被压迫者，他还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例如，共产党在1930年2月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共中央想借助鲁迅的声望，希望他也能做该盟的发起人，就派与鲁迅接近的党员冯雪峰去联系，据雪峰回忆，鲁迅并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一成立马上就会被解散，不能起什么实际作用，但他还是答应参加。他的名字原来排在下面的，到发表出来时，却升到第二名了（第一名是郁达夫），这当然很引起当局的注意，于是就有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之事。既然如此，他只有用硬功夫来对付。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决不会在压迫者面前屈服。直到逝世前不久，国民党当局通过鲁迅一个旧日的学生与他联系，说是可以解除通缉令，但希望“预先得到先生的谅解”，却被鲁迅所拒绝。他写信回复道：“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sup>①</sup>

接着，在1930年3月，鲁迅又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而且也应邀成为它的发起人之一。但他对这个组织也并不看好，在当月27日致章廷谦信中即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飚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按：原文如此），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也。哀哉！”这就是说，鲁迅之参加这个组织，还是出于爱护和培养青年之心。虽然他对左联有自己的看法，但当这个组织受到压迫，它的成员被捕、被害时，他仍要站出来抗议、斗争。

当然，鲁迅后期思想也有很大的变化。正如他自己在《三闲集·序言》中所

<sup>①</sup> 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纪念集》。

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又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但是，他的个性主义并没有同时轰毁。虽然鲁迅此时已从进化论转向阶级论，而阶级论必然要走向集团主义，但他仍时时保持自己的见解。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他就反对“革命文学家”们的思想意识至上论，而同时强调文艺的审美性；反对超越时代论和虚假的理想性，而坚持文艺的现实性。左联成立之后，他对那些过激措施也很不满意，不参加这些活动，也不理会反“作品主义”的论调，而坚持用自己的笔参加战斗。所以，鲁迅与那些领导人时常发生矛盾，也就并不奇怪了。

鲁迅与左联某些领导人的矛盾，不是仅限于最后一年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从“花边文学”的讥笑，到“调和派”的诬蔑，花样简直层出不穷，以至使鲁迅觉得要横站着战斗，以防“战友”从背后射来的冷箭。他最后对于周扬等人的鞭挞，只不过是矛盾的总爆发；而周扬等人却始终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顶多只是对鲁迅不够尊重罢了。这也只是因为鲁迅的地位过于崇高，才有此说，看看1949年以后，整了这么多作家，他又尊重过谁呢？可见这不是个人间事，而是两种文化两种思想的冲突。这一边是要求别人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那一边则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所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场斗争的意义，鲁迅自己是认识得很清楚的，所以他才会抱病修改补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并说：“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sup>①</sup>鲁迅一直在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而斗争。

当然，一个人不可能完全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不可能没有思想上的局

<sup>①</sup> 1936年8月28日致杨霁云信。

限，鲁迅也不例外。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在就“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问题所作的《答文艺新闻社问》中说：“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方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这后一部分意见，原是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当时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甚至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也影响了鲁迅。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鲁迅于次年还写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和《我们不再受骗了》，为苏联的贫困和专政辩护。在今天看来，其中有些意见显然不符合实际，但在当时有这样的看法却并不奇怪。因为上个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却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整个世界的知识阶级都在向左转，个人主义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和纪德，都向往苏联，为苏联辩护。他们是到苏联参观，看到了某些真相之后，才有所怀疑，有所批评——纪德因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而引起左派文人的围攻，其中包括罗曼·罗兰；但等到五十年后罗曼·罗兰本人的《莫斯科日记》发表出来，人们才知道，原来他自己也有批评意见，只是生前不愿公布而已。

鲁迅本有两次访问苏联的机会，一次是在1932年，高尔基邀请他去参加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鲁迅那时很向往苏联，本来准备要去的，但临时右脚神经痛，接着又因母病赴北平探亲，没有去成；第二次是在1935年，鲁迅却已不愿意去了。据知情人说，1935年冬，胡愈之正要从香港出发赴莫斯科之前，“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又来电要宣侠父设法转请鲁迅先生前往莫斯科治病，为此，侠父又请愈之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回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与鲁迅先生商量。鲁迅表示不愿意去，原因是如他去苏联，他就不便于及时在国内发表文章，不能与蒋介石反动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发挥不了战斗作用。鲁迅还说，在上海，国民党最多把我枪毙了，但他们不敢！如果到了莫斯科反而不见得好。另外，他从报上得知斯大林正在搞肃反扩大化，他在这种时候去苏联也不合适。愈之尊重鲁迅先生本人意见，只好单身又回到香港。”<sup>①</sup>关于这段往事，胡

<sup>①</sup> 金城：《党的坚强战士》，《胡愈之印象记》增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8月第二版。

愈之本人在1972年12月间接受北京鲁迅博物馆采访时也曾说到,只是在1976年10月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上发表这篇访问记时,对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的看法被删掉了,严家炎教授在《东西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鲁迅思想的超越》一文中,根据胡愈之校订过的原始纪录加以补足。这段被删掉的话是:“再后他又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鲁迅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放心。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

可见,这时鲁迅对苏联的看法已有转变,也可见他对斯大林的专制主义的反感。

## 文艺创作的自主意识

说到文艺创作问题,人们很容易将鲁迅与“遵命文学”的口号联系在一起,好像鲁迅是“遵命文学”的倡导者。这是一种宣传力量导致的误解,我们大家都曾经接受过这种说法。

不错,鲁迅谈到他在《新青年》时期的小说创作时,的确曾经说过:“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但这语气很有点勉强,而且带有某种调侃意味。所以接着做出许多解释:“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sup>①</sup>这解释,可与《呐喊·自序》中“须听将令”的话联系起来看:“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若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正因为意见本来相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我说他语气勉强,且有调侃意味,不但从这段话本身读出,而且还有其他材料可作旁证。这就是鲁迅在《〈农夫〉译后附记》中所说的话:“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

<sup>①</sup>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白白证明着这事真实。”“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云。”可见鲁迅所说的“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显然是针对着新月社和创造社的“遵命文学”而来的，是一种调侃，一种反讽。后来的人为了强调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不管鲁迅说话的语境，抽取出来，作为鲁迅所提倡的创作口号了。

鲁迅说：“凡对于以真话为笑话的，以笑话为真话的，以笑话为笑话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说话。于是我从此不说话。”<sup>①</sup>何况鲁迅已死，他也无从说话了。

但如果查阅一下鲁迅著作，我们就会发现，鲁迅是一向主张创作的自主性的。还在北京时期，鲁迅就反对配合形势去写作，他说：“即使是真的文学大家，然而却不是‘诗文大全’，每一个题目一定有一篇文章，每一回案件一定有一通狂喊。他会在万籁无声时大呼，也会在金鼓喧阗中沉默。”<sup>②</sup>在广州，他又说过：“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sup>③</sup>直到晚年病重时，他还说：“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sup>④</sup>这里说的是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

最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1927年12月在上海暨南大学做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这里，鲁迅开宗明义就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在冲突之中”。冲突的原因，在于文艺和政治的趋向不同：“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到了19世纪以后，出现了反抗的文艺，就和政治不断地冲突起来。“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有人说，鲁迅在这里是指革命文艺与反动政治的冲突，而革命文艺与革命

① 《坟·说胡须》。

②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一)》。

③ 《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④ 《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政治是统一的,相互促进的。其实不然,这并非鲁迅的原意。鲁迅说的是文艺与政治本身的冲突。所以他接着就分析革命成功之后的情况:“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艺术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艺术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

这就涉及人们常常提出的一种假设:鲁迅如果活到今天会采取什么态度?是歌颂呢,还是继续批判?我想,还是应该从鲁迅自己的话里去寻找答案。鲁迅说:“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居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可见,在鲁迅看来,批判是文学的根本使命,只有高举批判的旗帜,才能促使社会的进步。

到得30年代,鲁迅深化此项命题的研究,又提出了“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的概念。1932年11月22日,他在北京大学做的一个演讲,题目就叫做《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可以分为两大类: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用现代话讲起来,就是“在朝”的文学;山林文学则是“下野”的文学,“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什么是帮忙文学?就是帮主人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至于帮闲文学,则是帮主人消闲的东西。鲁迅举例说:“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篋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篋片文学。小说就做着篋片的职务。”——当然,这是指供人消闲的小说。

鲁迅用这个观点来观照文学史,就找出许多具体的实例。他认为,《诗经》中有几篇是用于侑酒的,也就有帮闲的成分;屈原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司马相如以辞赋见长,被“俳优蓄之”,也是一个帮闲,但他不满于这种待遇,“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关于封禅的文章,

藏在家里，以见他也有计画大典——帮忙的本领，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寿终正寝’了。”<sup>①</sup>纵观中国文学史，鲁迅认为：“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不太多。”所以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鲁迅说：“看起来实在也不错。”<sup>②</sup>

当然，鲁迅并不想在杂文和演讲里系统书写中国文学史，只是为了揭露现代帮闲文人，而探索其历史渊源。正如他自己所说：“‘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sup>③</sup>这里，说古是为了道今。或者，如马克思所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sup>④</sup>那么，知今又有利于说古。鲁迅是在观察现代文坛上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之后，才对古代文学有更深入的理解。

鲁迅对于当时文坛的剖析，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所谓“京海之争”，先是“京派”作家沈从文撰文奚落“海派”文人，接着，“海派”文人苏汶撰文还击，于是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鲁迅当时写了一篇不满千字的短文：《“京派”与“海派”》，却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他说：“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这种剖析，真是入木三分。至于后来京海两派互送秋波，做起一碗“京海杂烩”来，那是另一回事了，但也还是利益问题作怪。

现在有些人对鲁迅的批判精神颇有非议，认为他好斗，缺乏宽容之心，有违自由思想原则。其实，鲁迅的批判，就是为了争取思想自由。鲁迅的文章，并非都是阶级观点之争，更多的是对于文人依附思想的批判。比如，他对于“现

① 《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

② 《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③ 《花边文学·又是“莎士比亚”》。

④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